

《史通》评释诸本述略

张新民

历代研治《史通》者，其流为四：一为评论，如唐柳璨《史通析微》、清纪昀《史通削繁》；二为校仇，如何焯、卢文弨、顾广圻、冯已苍、钱遵王诸家；三为注释，如《史通评释》、《史通订注》、《史通训故补》、《史通通释》；四为续补，如陆深《史通会要》、宋慈抱《续史通》、许钟璐《史通赘议》、汪之昌《补史通》。清以前诸家之本，以浦起龙《史通通释》最为可读，解放后程千帆先生刊有《史通笺记》、张舜徽先生刊有《史通平议》，而张振珮先生《史通笺注》熔校、笺、注、评于一炉，厥功甚伟，考校最精。爰就其时序，述之于下。

唐代 柳璨《史通析微》 唐昭宗光化三年（900）史官柳璨以《史通》议驳经史过当，纪知几之失，别纂十卷，号《柳氏释史》，又号《史通析微》，学者服其优贍。晁公武言其书“共成五十篇，萧统云‘论则析理精微，故以为名’”^①。《中兴书目》称《析微》十卷，随篇评论其失，凡四十九篇，又第十篇摭知几《四朝实录》之失^②。此为作专书议驳《史通》最早者。据《郡斋读书志》卷七，其书乃就维护儒家传统立言，故对知几“妄诬圣哲，评汤德为伪迹，论桀恶为厚诬，谤周公云不臣，褒武庚以徇节，其甚至于弹劾仲尼”，深致不满，因有此作，已佚。

宋代 孙何《驳史通》 《宋史》卷三〇六本传称孙何笃学嗜

古，为文必本经义，著《驳史通》十余篇，另有《春秋意》、《尊儒教议》诸书，可知其所驳亦为知几讥弹前贤之论。

明代 陆深《史通会要》 深校定《史通》之余，复采其中精粹者，编为《会要》三卷，分建置、家法、品流、义例、书凡、修词、叙事、效法、雋家、篇目、丛篇诸目，阑以后人论史之语，间附己见，收入嘉靖自刻《俨山外集》中。清儒訾议，认为《史通》之分内外篇，界限自有深意，故为后来作史所取法，深既知校定其书，岂尚不知其著作之妙用，乃取而割裂之，附以后人之作，可谓误用心思矣^③。

李维桢、郭延年《史通评释》 万历年间李维桢就张鼎恩本，略为评论。嗣后延年得其父子章自黔中所寄张鼎恩本，复加芟正。篇中史官姓名，自孔衍、荀悦以下俱著其爵里，间以己意为之评论。既就，李维桢赠张之象本，复补足《补注》、《因习》二篇全文，校正二百三十余字，续成《史通评释》二十卷，为最早训释《史通》者。篇中维桢语皆以“评曰”标出，延年所补则注明“附评”，四库馆臣谓维桢所评，不出明人游谈之习，无足置论，延年所释，较有引据，而所征故事，率不著其出典，亦颇有舛漏，故王惟俭以下注《史通》者数家，皆嫌其未惬，多所纠正。书中附有于慎行《史通举正论》。

陈继儒《史通订注》 据《史通评释》参校蜀刻、吴刻。注文以本篇为题，次第注之，事少字少者及音义注见册颠，复出之注标明见某卷，一人而二、三注者，其人同其事异，各以其题注之。评有总评，有细评。总评列于前，细评列于事之后。注文或序作书之旨并其作者，或序其爵里，或序其事之颠末，类多习见，殊少新义。今原刻藏南京图书馆，《明史·艺文志》及其他公私书目几无一著录，训释者仅见张振珮先生《史通笺注》采及。

王惟俭《史通训故》 王氏撰《文心雕龙训故》毕，以李、

郭二氏《评释》与己意多不合，乃以注《文心雕龙》之例，复取《史通》注之，称《史通训故》。《训故》本以《评释》参校张之象所藏宋本，王氏自谓除增《因习》一篇及更定《直书》、《曲笔》二篇外，共校正一千一百四十二字^④。四库馆臣取与《评释》相核，言惟《曲笔》篇增入一百一十九字，《因习》、《直书》二篇与郭本相同，无增入之语，并云《评释》漏略实甚，惟俭所补，引证较详。然黄叔琳、浦起龙继注是书，尚多驳正。盖知几博极史籍，于斯事为专门，又唐以前书今不尽见，后人捃拾残剩，比附推求，实非一二人之耳目所能遍考^⑤。周中孚亦称其书于每篇后引书为注，但可名为注，而不可名为训故，此明人不谙古义之一证。其注虽较郭注为详，然未免失之踳驳，故黄叔琳、浦起龙两家为之补正，当以最后之本为定本^⑥。《训故》刊刻后，传本极少，王士禛生值明末，去惟俭未远，访求二十余年始得之。其卷帙，明王圻编《续文献通考·经籍考》作“六十”入录，误，应以《四库存目》、《郑堂读书记》所云“二十”为是。

清代 黄叔琳《史通训故补》 叔琳乾隆三年辑注《文心雕龙》（有养素堂本）后，又于十二年（1747）据王惟俭本，补缺删繁，广所未备，刊定此书。盖王本依据正史，选择精严，然失之于简，或缺而不注，或注而不全，且鲁鱼亥豕，尚有沿误；而延年所注，盛行书塾，援引踳驳，枝蔓无益，又疏于考订，每多纰谬，故复加增补，重梓行世。此本于王注稍有删节，仍存旧名，自所加注则标“补”字以别之。凡王氏误者，或迳改注，或添卷尾，或指驳上方，又仿前《文心雕龙》之例，于知几议论精当处，加之圈点，以志别择，偶有己见，附列上方，惟于《疑古》、《疑经》诸篇非圣无法，深致不满，一概削锄，殊失允当。因刊板在都，又称北平本。书与浦起龙《史通通释》同时而稍先，故浦氏得以摭采。《四库存目》谓浦本注释精核，而失于好改原文，又评注夹

杂，俨如坊刻古文之例，是其所短。此本注释不及起龙，而不堪改窜，犹属谨严，其圈点批语，不出时文之式，则与起龙略同。⑦

浦起龙《史通通释》 旧注递相增补，互有短长，履心者寡。乾隆己未（1739）浦氏于苏州府教授任上得王惟俭本，循览粗过。乙丑（乾隆十年，1745）归老，复获郭延年本，病前者“善匿”，后者“臆评”，乃旁搜博采，丰取矜择，于戊辰（乾隆十三年，1748）撰成初稿。会北平本新至，又参互补订，增录数条，得书二十卷，乾隆十七年（1752）梓行。浦本以兼举其义与辞而谓之训正，凡六类：一曰释，二曰按，三曰证释，四曰证按，五曰夹释，六曰杂按；又以是正谬脱衍窜者为刊讹，其别有四：一曰字之失，二曰句之违，三曰节之滑，四曰简之错。全书引据详明，考定精审，惟轻于改窜，往往失其本旨。其中正文大书，并不言宋本，而一一符合，殆即卢文弨所见华亭朱氏影钞宋本，浦氏特攘掠以自示精审。至于句解章评，参差连写，如坊刻古文之式，有乖注书体例，尤为通人所讥，而专臆恣改、阴用前人之说者亦屡见不鲜。浦书流传极广，清代版本有求放心斋本、向山阁本、翰墨园本、志古堂本，而以求放心斋初印本为最好。

民国 刘虎如《史通》选注 民国十七年商务印书馆版，收入国学丛书中。注本割裂原书次第，重新臆排前后篇目，计有自叙（原内篇第三十六）、六家（原内篇第一）、古今正史（原外篇第二）、史官建置（原外篇第一）、杂述（原内篇第三十四）、核才（原内篇三十）、辨职（原内篇第三十五）、采撰（原内篇第十五）、探赜（原内篇第二十七）、鉴识（原内篇第二十六）、品藻（原内篇第二十三）、书事（原内篇第二十九）、模拟（原内篇第二十八）、因习（原内篇第十八）、言语（原内篇第二十）、直书（原内篇第二十四），共十七篇。书前冠有选注者叙言，论作者生平、著书本意、主张及全书概要、各篇主旨。注文悉本《通释》，仅将文字改为通俗文言（旧称新民体）。台湾台北文

星书店一九六五年重印。

吕思勉《史通评》 商务印书馆国学小丛书本，民国二十三年初版，次年再版。著者以今文经学家立场对《史通》逐篇评议推论，得知几著书本旨甚多，然失之者亦不少。198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将《史通评》与《历史研究法》、《中国史籍读法》、《文史通议评》合为《史学四种》，收入中国当代史学家丛书出版。

解放后 程千帆《史通笺记》 著者别有《史通》批校本，以翰墨园《通释》为底本，参校移录向宗鲁校本及向氏所录杨守敬校本、纪昀删繁底本识语，并采及卢文弨《郡书拾补》、孙毓修《札记》等诸家之说。又别为《笺记》，其旨有八：一曰拾遗，凡诸家旧说未备者，均补益之；二曰订误，旧说可绳者，别而纠之；三曰本证，凡知几牴牾失应者，概辨而定之；四曰旁征，凡诠释不能尽知《史通》原旨者，则曲畅而旁通之；五曰究源，凡知几所取资者，悉加甄录而明其所自；六曰竟委，凡《史通》影响后人者，不论异同，皆依其指陈，采供参稽；七曰贵近，凡近世史学关涉《史通》而与《笺记》体例相符者，博取而详著之；八曰崇实，凡所引据，必核原书，并附书目表以供覆核。其所征引，唐以前史籍固多，唐以后以及近人撰述亦不少。《体统》、《纰谬》、《弛张》三篇佚文，仿黄季刚先生《文心雕龙札记》补《隐秀》篇例，以汪之昌拟者补之。此书虽系摘句选笺，未窥全豹，而为浦氏以后增释诸家用力最勤者。近悉千帆先生与其高足续补《史通笺记拾遗》，不日观成，当益臻完备。有中华书局1980年排印本。

张舜徽《史通平议》 此书凡六卷，与《通志平议》、《文史通议平议》合装一册，中华书局1983年版。盖张舜徽先生启导及门读史，皆先以此三书。讲习余暇，凡书中议论之精者，表而出之；其或疏舛，辄加考明。《自序》谓“余耽悦是书，治之三反，偶有所悟，辄于书之上下皆满，尝据唐以上旧史，以补苴罅

漏，亦间抒所见，以论列其是非，苟遇刘氏起例发凡，实为后世史学有启牖之功者，则亦表而出之，以志服膺之意焉。”书以评议为主，辅以考据，于刘氏底蕴多所发抒，所据之本则为浦氏《通释》。

张振珮《史通笺注》 著者长期研治《史通》，因病浦氏之书轻于改窜，往往失其本旨，且有不能尽知出处者，而浦氏之后二百余年，训释校勘，累屋重架，层垒增补，全面笺注绝无嗣响，乃专精毕力，载阅寒暑，穷搜博采，探幽索隐，于1982年撰成《笺注》近七十万言。《笺注》以张之象本为底本，精心参校陆深、张鼎恩、郭延年、陈继儒、黄叔琳、浦起龙、纪昀诸家刻本或手批本，并旁及卢文弨、孙毓修、顾广圻诸家校识，脱者补，误者正，衍者删，校改均说明根据，不凭臆测，并用标号将原字注之于下，务求原书之真而使读者知所别择，颇得校勘深义，为诸本中之最精者。训释则仿郑氏诗笺之义，笺其本事本旨，必穷其溯，注释难词难字，必畅其义。凡前人及时贤之长，必标而采之，非者或舍之，或疏通证明之，不足者加按语以阐释之，应注而未注者钩稽事实以增益之。记诵之博，考订之精，言之有据，超迈前人。又于各篇之首冠以解题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，揭示推阐全篇要旨及其在中国史学史上之地位，衡其得失，明彼由绪，多为著者长期覃精沈思，创为新解者。书末附有刘知几学行编年简表，并辑录知几现存文赋、知几亡佚著作存目及《史通》各种版本之序、跋、著录与品评。古今括囊，其津逮后学，式昭方来，历代注家难与抗衡。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。

可论者，尚有年谱之作，除前述张振珮先生《刘知几学行编年简表》外，别有周品瑛、刘汉之、朱希祖、傅振伦四家之作^⑧。其中傅振伦先生《刘知几年谱》几经再版，传播最广，影响最大，考订亦精。内容首述刘知几史学地位，次述其家世、学行交游，

又按年月编列其一生行事，而以后记概论生平，殿为结论。知人论世，亦为研究《史通》者所必读。

注：

①《郡斋读书志》卷七，史评类。

②《玉海》卷四十九，《艺文门》，文史类引。

③《郑堂读书记》卷三十五，史评类。

④王惟俭：《史通训故》序及题识。

⑤《四库存目提要》卷八十九，史评类，史通训故条。

⑥《郑堂读书记》卷三十五，史评类。

⑦《四库存目提要》卷八十九，史评类，史通训故补条。

⑧周品瑛《刘知几年谱》，载《东方杂志》第31卷第19号；刘汉之《刘子玄年谱》，载《努力学报》1929年第1期；朱希祖《刘子玄年谱》，稿本，未见刊行；傅振伦《刘知几年谱》，商务印书馆1934年初版，1963年中华书局重版印行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

